

東北懸疑敘事下的遮蔽與想像——論《平原上的摩西》中的交叉性與超越性

王鑫潔*

摘要 作為雙雪濤筆下最典型的創作實踐，東北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與創傷經驗成為文學批評界介入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摩西〉的主要研究視域。然而這一文本隱含的結構和意義的交叉性仍然亟待關注。本文將以〈平原上的摩西〉作為分析對象，探索雙雪濤的“中國套盒”式懸疑敘事與其結構背後的意義交叉性，即個體如何在階級、性別、代際等多重身份交織下，成為社會轉型中的零餘者。敘事結構的交叉性同樣為雙雪濤故事中的底層書寫保留了“向上超越”的可能，故事主人公們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信仰與堅守，正是在階級、性別、代際的層層交織中傳承下來。

關鍵詞 雙雪濤 敘事結構 交叉性 底層書寫

一 引言

“鐵西三劍客”雙雪濤、鄭執、班宇關於鐵西敘事的寫作序列，令東北書寫再次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浮出歷史地表，三人圍繞東北老工業區的相關創作，則被視為“東北文藝復興”的重要表徵。以雙雪濤為例，東北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已成為其筆下最典型的創作實踐：這種依托於地域結構性轉型的懸疑敘事，既不以揭曉懸念為最終目的，也未遵循本土懸疑小說中“因果報應”的樸素道德信仰敘事倫理，而是通過個體對於歷史記憶的追溯與重構，反映東北在經歷文革和下崗潮後的時代症候，以及個體在時代症候下被遮蔽的創傷經驗。雙雪濤本人將這一努力稱之為“為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我的故鄉人留一點虛構的記錄”¹。

然而，對於東北地域書寫應在三位青年小說家的創作中處於何種位置、又佔何種分量，學界回應不一。出身東北的批評家往往強調與東北相關的在地經驗，將地域書寫鑲嵌在九十年代國家經濟結構性轉型的宏觀敘事中來探討。出身瀋陽的劉岩，致力於將鐵西敘事放置在東北經濟結構性轉型的時代框架中，將雙雪濤、鄭執、班宇放置在“東北國營工廠工人子弟”的身份政治下進行檢視。在劉岩看來，他們的寫作因為將個體經驗與特定歷史條件、微觀敘事與宏觀敘事有機結合，

* 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主修藝術史、中國語言文學。

¹ 雙雪濤、三色堇：〈寫小說是為了證明自己不庸俗〉，《北京青年報》，2016年9月22日。

而具深刻的現實主義傾向。² 同樣出身東北的黃平認為，“鐵西三劍客”的創作代表著“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他們以鐵西敘事來反撥“‘尋根文學’以來將地方‘地方化’的趨勢”，令地域書寫重新“從‘地方’回到‘國家’，從‘特徵’回到‘結構’，從‘怪誕的人’回到‘普通的人’”。³ 不同於重視東北在地經驗的本土學者，非本土批評家則呼籲關注雙雪濤、班宇、鄭執在創作中除“東北”之外的其他面向。張定浩認為，過分強調“東北”特定集體情緒和邊緣生活經驗，實際上遮蔽了基於普遍人性的個體敘事，限制了作品所能抵達的高度。⁴ 叢治辰則將“父親”看作文學裝置，呼籲批評界探索三位小說家作品中被“東北”這個單一研究視域所遮蔽的其他可能。⁵

作為雙雪濤最受文學批評界關注的作品，東北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與創傷經驗、“艷粉街”的文化表徵、故鄉記憶與文學創作等問題，成為批評家對文本的意義外延；多重第一人稱敘述的作用與意義、“何謂平原，誰是摩西？”、底層書寫的超越性等問題，則成為文本“內部批評”的論證焦點。創傷與救贖成為〈平原上的摩西〉故事的一體兩面：由東北國營工廠下崗潮引發的工人階級的創傷，是批評家們重點分析的對象，但他們較少關注創傷背後的交叉性，即個體如何在階級、性別、代際等多重身份交織下，在歷史的必然與命運的偶然的交織下，成為社會轉型中的零餘者。同樣地，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信仰與堅守，也正是在階級、性別、代際的層層交織中傳承下來，為雙雪濤故事中的底層書寫保留“向上超越”的可能。⁶ 此兩點為本文將深究的面向。

二 “中國套盒”敘事下的交叉性

〈平原上的摩西〉的故事內容並不複雜：刑警莊樹在負責偵查城管遇襲案時，發現這起案子與十二年前劫殺出租車司機的連環案件有著諸多重合，而案件嫌疑人漸漸指向兒時鄰居家的父女。國企改制前，同是東北國營工廠工人子弟的莊樹和李斐是鄰居兼童年玩伴，兩人曾約定好在平安夜的晚上一起看“平原上的火焰”；國企改制後，因生存共同體的瓦解，兩家人漸行漸遠。隨著調查的深入，莊樹漸漸發現自己當年忘記約定的無心之失，竟成為李斐悲劇命運的導火索。故事藉助多重（共七位）第一人稱敘事者的視角，交替進行了十四次敘述，分別是：

² 劉岩：〈世紀之交的東北經驗、反自動化書寫與一座小說城的崛起——雙雪濤、班宇、鄭執瀋陽敘事綜論〉，《文藝爭鳴》，2019年11期，頁22。

³ 黃平：《出東北記：從東北書寫到算法時代的文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頁87-88。

⁴ 呂彥霖：〈再造“集體記憶”與重探90年代——以雙雪濤、班宇、鄭執為中心〉，《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6期，頁29。

⁵ 叢治辰：〈父親：作為一種文學裝置——理解雙雪濤、班宇、鄭執的一種角度〉，《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4期，頁75。

⁶ 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文藝爭鳴》，2019年7期，頁39。

莊德增、蔣不凡、李斐、傅東心、李斐、莊德增、莊樹、孫天博、傅東心、李斐、莊樹、趙小東、李斐、莊樹；每人敘述的故事都多少與下一位敘事者的故事有所重疊，引出人物命運的改寫與顛覆，營造出記憶的迷宮。

如何理解多重第一人稱敘事，已成為文本“內部批評”的論證焦點。黃平將這種敘事歸因於對時代總體性的難以把握，即“在小說故事開始啟動的歷史時刻，任何一個人物都無法把握時代的總體性。”⁷ 劉岩從重構歷史記憶的角度出發，將多重第一人稱視角的敘事，視作離散的工人群體“圍繞社群瓦解過程進行對話的形式”。⁸ 上述兩種分析傾向將多重第一人稱視角與歷史整體性變革相結合，還原工人階級在東北經濟結構轉型期的時代創傷。這種將敘事手法歷史化的嘗試，一方面將文本與東北這一特殊地域與經濟體制改革這一特殊時間節點結合，揭示東北在轉型期的社會症候，但另一方面又將故事中的層層嵌套，簡化為工人群體的敘事詩，遮蔽了這種複調敘事中的其他指涉。

層層嵌套的敘事特點，令人聯想到略薩所分析的“中國套盒”，即通過敘述者在時間、空間和現實層面的變換，實現故事的層層嵌套。⁹ 〈平原上的摩西〉中，多重第一人稱視角敘事也可看作是“中國套盒”的變體：每位敘述者的故事均有交叉性，故事與故事之間並非簡單並置，而組成了“共生或者具有互相影響效果的聯合體”。¹⁰ 李守廉的形象正是在交叉敘事中得到豐滿，又反過來作為線索串起社會群像。他是全篇中唯一沒有以第一人稱視角敘述的人物，但他的身影卻出現在幾乎每位敘述者的故事中——李守廉因為陪同李斐前去放烟火而遭到警察蔣不凡的懷疑，無奈之下重傷了蔣不凡；李守廉在下崗潮後與莊德增、傅東心一家漸行漸遠，在襲警後受孫天博一家的庇護而生存，卻又因襲擊城管一案再次進入警察莊樹、趙小東的視線。

小說的敘事迷宮不僅還原出李守廉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形象與其創傷記憶，更以李守廉為交叉性敘事的隱形中心，串聯起東北大下崗潮中的失落群像：比如試圖挽救社會失序而以身試險的警察、遭遇歷史性暴力又被禁錮於家庭的知識女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傅東心等人的形象不僅是功能性的，非如黃平所言，因“帶有鮮明的功能性而顯得概念化”，其功能之一就是“將‘形而上’的維度重新賦予作為工人的李守廉一家”。¹¹ 相反，傅東心、李斐等女性角色，導向了〈平原上的摩西〉被“東北”這個單一研究視域所遮蔽的其他可能。對工人群體創傷經驗

⁷ 黃平：《出東北記》，頁 60。

⁸ 劉岩：〈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以《平原上的摩西》為中心〉，《文藝研究》，2018 年 12 期，頁 16。

⁹ （秘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著作，趙德明譯：《略薩作品：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年），頁 163。

¹⁰ 略薩：《略薩作品：給青年小說家的信》，頁 160-161。

¹¹ 黃平：《出東北記》，頁 71。

的再現，是雙雪濤的敘事重點，但他對多重第一人稱視角的選擇，同樣顯示出敘事交叉性的重要意義：在以工人群體為核心的社群網絡中，那些擔任著母親、女兒等性別角色的人，擔任著國家機器、知識分子等社會角色的人，同是社會創傷的承受者；以點帶面地還原他們所遭受的傷痛，成為雙雪濤為被侮辱被損害的故鄉人留下記錄的方式。

〈平原上的摩西〉因此由敘述結構的交叉性轉向敘事意義的“交叉性”。“交叉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由學者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強調受壓迫者的經驗是由階級、種族等多重壓迫機制與父權制互動的結果，不能將被壓迫的經驗簡單化為階級、種族、性別壓迫的機械性疊加。¹² 以下將以克倫肖的“交叉性”理論作為敘事意義的分析框架，認為〈平原上的摩西〉僅指向東北下崗潮後工人階級的受創史，更表現出東北社會底層人民（尤其是女性）在階級、性別、代際變革中所遭遇的交叉性暴力。

三 交叉性中的二元複調

在“中國套盒”式的複調敘事下，〈平原上的摩西〉中的人物關係往往呈現出或對照或鏡像的二元性。這種二元的人物塑造方式與階級、性別、代際等因素雜糅，呈現出以工人群體為中心輻散的東北老工業區底層人物書寫。

幾乎為論者們所公認的一組人物對照，是在下崗潮導致的工人階級“所擁有的生活共同體趨於破碎”後，出現在莊德增、李守廉兩人之間的階級分化。¹³ 在千禧年之際意外相遇的莊、李二人，一個是將捲烟廠私有化的資本家，一個是因重傷警察而隱姓埋名的出租車司機。面對毛主席像下靜坐抗議的老人時，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莊作出的評價是：“也許忍著，就有希望。”¹⁴ 而淪為社會零餘者的李，卻將老人們比作海水被污染後上岸自殺的海豚，反駁道：“就是希望不夠分，都讓你們這種人佔了。”¹⁵ 對巨型毛主席像的體認，進一步反映出二人因階級分化而形成的情感結構差異：莊將毛主席像體認為故鄉之樹，展現對於毛主席像所象徵的集體主義時期的浪漫化懷舊；李則將懷舊之情移情到毛主席像底座處的工農兵戰士塑像上，這些破碎的塑像與小說所敘述的底層人物，形成身體化的同構，暗示著東北社會底層人們破碎的身體，與被侮辱被損害的命運：如同海豚自殺般靜坐的老人，左腮被子彈擊穿的李守廉，下肢癱瘓的李斐，被嚴重燙傷面部的小販女兒……劉岩對此質問道：“在社會變遷中斷裂的意識形態可以縫合並重塑，

¹² 王天夫、嚴飛：《清華社會學評論（第8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頁142。

¹³ 黃平：《出東北記》，頁62。

¹⁴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頁49。

¹⁵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49。

銘刻歷史創傷的普通生命也能隨之修復嗎？”¹⁶ 儘管毛主席像作為意識形態的能指重新回到廣場，其底座的工農兵塑像也隨之被修復，但工人階級社群在社會轉型、階級分化後所遭受的創傷，卻以“破碎的身體”為表現形式而被永遠銘刻。

第二組較少被關注的人物對照，是小說中性別關係的對照：女性常成為歷史暴力下隱忍的承受者，但同時也是詩性、人性、神性的守護者；男性則往往成為歷史暴力下正面的感知者或對抗者。不同於蔣不凡、李守廉的“以暴制暴”，無論是傅東心、李斐，還是燙傷事件中的女兒，都是結構性暴力下無從反抗的受害者：傅東心在文革中被剝奪了知識分子身份與受教育的權利，又在陰差陽錯中與當年害死叔叔的凶手莊德增結合；李斐因警察蔣不凡濫用公權力而失去雙腿，從此與父親隱姓埋名地生活；跟著母親賣苞米的女孩因城管的暴力執法而被嚴重燙傷面部，卻被有關部門剝奪了為自己辯護的話語權。在遭受結構性暴力後，她們淪為被放逐於社會主流之外的零餘者。作為知識女性的傅東心在工作與家庭中，處於雙重邊緣化的位置，既不為工廠同事所接納，也不與丈夫兒子親近。無論是丈夫還是兒子，都留有那個時代的暴力殘影，因此她自述道：“日子嗒嗒地向前走了。我留了下來。”¹⁷ 李斐則深居簡出，藉寫小說度過癱瘓後的漫長歲月，並在自敘中以樹自比：“樹，無法走動的樹，孤立無援的樹。”¹⁸ 傅東心與李斐在社會巨變中的“留”，暗示東北的底層女性在階級、性別、代際等身份交織下忍受的交叉性暴力，一方面使她們無法與社會同步，另一方面則成為她們自我放逐的方式，以此實現對於男性主導的結構性暴力的規避與逃離。

因此，雙雪濤筆下的女性，並非如五四時期的“祥林嫂”形象那般，僅是“被侮辱被損害的啞啞的女性”，而是在巨變的時代中，以自我保留的方式守護著詩性、人性、神性。¹⁹ 雙雪濤將傅東心視作詩性的化身，“她的隱忍，她的沉默，她的寂滅，其實是詩的隱忍，沉默和寂滅，她與周遭的隔閡，其實是詩與現實世界的隔閡，”唯有傅東心可以承擔“與時光對抗”這一重任。²⁰ 是傅東心令李斐懂得了“欣賞行文的元氣”，令詩性的種子在小小的李斐心中萌芽；感受到從未體驗過的母愛，明白母親的職責並非“哭，一個嘴巴”，而是提供關於人性的基本啟蒙；篤信“只要你心裏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裏的念是誠的，高山大海都會給你讓路”，²¹ 感受在平凡生活中呼喚神性的可能。儘管對莊樹來說，傅東心是個不甚親近的母親，但唯有傅東心懂得莊樹“對別人有意義，對自己也有意義”

¹⁶ 劉岩：〈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頁 21。

¹⁷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 73。

¹⁸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 74。

¹⁹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洛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37-40。

²⁰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豆瓣，2016 年 8 月 1 日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017907/>）。

²¹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 32-37。

的警察理想。²² 她在送給莊樹的畢業禮物上畫著一個小男孩與小女孩，男孩守門，女孩正掄起腳把球提過來，這與幼時莊樹踢球、李斐守球的現實截然相反。莊樹由踢球者到守門人的角色對調，寄托著傅東心對莊樹的希冀，希望莊樹能成為一個可以守護他人的人，這與莊樹的警察理想暗合。換言之，正是傅東心在幼時對於李斐、莊樹的教育，令他們分別成長為堅守信念與守護他人的人，詩性、人性、神性的種子由傅東心播種，在李斐與莊樹身上發芽。

如果說傅東心代表著父一代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守護，那麼李斐則是傅東心在子一代的鏡像，她將傅東心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篤信傳承下去。張悅然與雙雪濤曾就“毛主席像”與“烟火”這兩個意象以及它們分別象徵的性別、代際能指進行討論：毛主席像與父輩、男性角色相關，象徵著“政治、歷史、現實”，烟火與子輩、女性角色相關，象徵著“約定、情感、夢幻”；兩個意象之間既是對立的又是辯證的：無形且短暫的烟火象徵著長久的允諾，有形且長久佇立的毛主席像卻只是疾馳而過的時代的象徵。²³ 李斐的一生，與“火/烟火”這一意象緊密相關。“火”這一意象在雙雪濤所援引的西方神話原型中具雙重意義，是毀滅亦是救贖，是罪惡亦是希望。²⁴ 對李斐來說，“火”象徵著她與傅東心之間的精神傳承，是李斐精神世界的起點。李斐對傅東心精神世界的無限接近，似乎一度可改變她作為工人階級子女的命運，用知識的火光為自己燃亮新的可能。儘管關於烟火的約定將李斐帶入了命運的深淵，但正是她對於信念的篤定，成為點亮這個基調並不明亮的故事的光。雙雪濤曾如此對比父輩與包括自己在內的子輩：“我覺得那代人是有力量的，即使是沈默的，比我們要有生命力，比我們要篤定，甚至比我們要豁的出去。我們以為我們是有那麼一點反抗精神的一代，其實我們非常平庸溫順。”²⁵ 李斐正是平庸溫順的子輩中的意外：她關於堅持的悲劇展現人在命運無常中的強大，她對於信念的篤定，成為雙雪濤對市場經濟下情感商品化的抗衡，也是雙雪濤所書寫的沉重現實背後的純淨內核。²⁶ 正因如此，雙雪濤的底層書寫沒有囿於沈湮苦難，反而保留了精神超越的可能。

四 未完成的“摩西”與向上超越的可能

《聖經·舊約》《出埃及記》中摩西分紅海的故事包含著逃亡、故鄉、信念、希望等文學母題，²⁷ 雙雪濤因此挪用了摩西這一神話原型，將摩西帶領以色列人

²²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頁 55。

²³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²⁴ 王俊虎、王晶：〈神話原型批評視域中的底層文學書寫——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中心〉，《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 年 2 期，頁 92。

²⁵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²⁶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²⁷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走出困境的寓言投射至東北國營工廠下崗潮背景中。這種對“神性”的挪用，暗示底層書寫困境中“向上超越”的可能。如何理解摩西也因此成為解讀小說的核心線索：哪位人物在故事中能承擔摩西的角色，帶領群體走出困境，實現“向上超越”？筆者認為，“摩西”的形象始終在不同階級、性別、代際間流轉，傅東心、李守廉、李斐、莊樹都部分展現出摩西的特質，但也都不能完全地承擔起摩西“出埃及記”式的責任，因而他的形象始終處於一種交織而成的、未完成的狀態。

在《出埃及記》中，摩西的形象具雙重性，他一方面代表耶和華立言發聲，具有博識與先知性；一方面身體力行地執行著耶和華的神諭，帶領族人抵禦埃及法老的種族壓迫並走出埃及，具戰鬥與守護精神。²⁸ 雙雪濤在塑造人物時，似乎正是按這樣的二分法，將摩西的雙重特質放置在女性角色與男性角色身上：傅東心與李斐凸顯出摩西的博識特質，李守廉與莊樹則顯示著摩西的戰鬥與守護精神。但雙雪濤沒有止步於性別的二分法，而是將性別與階級、代際交織起來，四位“摩西”的形象也因而複雜起來。從性別與代際角度來說，李斐、莊樹分別是傅東心、李守廉在子輩的鏡像：李斐從傅東心那裏繼承了對於詩性、人性、神性的堅守，莊樹則從李守廉那裏繼承了守護正義的戰鬥精神。

然而從階級角度來說，在 1995 年國營工廠解體後，四人依托的生存共同體隨之破碎，兩個家庭不再同處於工人階級的平原，階級落差的溝壑開始在兩者之間出現。因此，傅東心、莊樹儘管對李斐一家的遭遇抱以同情，卻又因為身份的隔閡而無法感同身受。此外，莊樹的警察身份令他在子一輩成為蔣不凡的鏡像，與李守廉的犯罪者身份形成了天然對立。雙雪濤曾在對談中將“二王”案件、蔣不凡案件與莊樹案件都列入小說主題的序列，並調侃道，“警察就是給人擦屁股的，這個‘人’是誰則需要去琢磨”。²⁹ 雙雪濤似乎暗示警察作為國家機器對社會秩序無條件的守護，以及不得不為經濟轉型的陣痛殿後的無奈。小說對於“二王”案件、蔣不凡形象的插入，使故事所描繪的圖景不再局限於莊、李兩家，而是指涉整個東北底層社會。因此，在性別、階級、代際的交織與隔閡下，四位分享著摩西特質的主人公，誰也無法成為誰的救贖，沒有誰可以帶領東北社會的底層民衆走出生存困境，摩西的形象因而也處於未完成狀態。“平原上的摩西”這一標題，再次暗示了摩西形象的未完成性：《出埃及記》中摩西將紅海一分為二，引領族人走出埃及；而莊樹在故事結尾，沒能真正將人工湖的湖水一分為二，暗示著橫互於莊樹、李斐之間的階級差距與創傷記憶再難彌合。莊樹唯一能做的，只是拿出浸滿童年溫情回憶的“平原”火柴盒，這一火柴盒見證了 1995 年的少女李斐對承諾的堅持、神性的篤信。

²⁸ 王俊虎、王晶：〈神話原型批評視域中的底層文學書寫〉，頁 92-93。

²⁹ 張悅然、雙雪濤：〈時間走廊裏的鞋子〉。

然而，儘管沒有摩西能帶領遭受創傷的人們走出東北，雙雪濤對《出埃及記》的援引，對傅東心、李守廉、李斐、莊樹等角色人性閃光的刻畫，依舊為東北底層書寫保留“向上超越”的可能。基督教曾在五四時期成為啓蒙中國現代文學書寫的資源性力量，周作人在《聖書與中國文學》中肯定文學與宗教在情感上的共通性，認為基督教的人文主義思想和文體形式可以為中國新文學帶來新的啓示。³⁰ 魯迅同樣肯定基督教對於人的生存信仰的探尋，認為希伯來民族乃“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³¹ 基督教因此參與了中國文學對人的生存境遇的現代性展望。然而，上世紀 80 年代先鋒文學以“放逐諸神”的文學實踐令基督教暫時從中國文學的寫作視野中淡出。³² 先鋒書寫之後，80 後作家雙雪濤再度將目光轉向對基督教元素的援引，以接續基督教對中國文學的參與，體現他希望為底層書寫尋找敘事信仰的努力。然而，不同於五四時期周氏兄弟的寫作實踐，雙雪濤在援引《出埃及記》時進行了“去宗教化”處理，弱化其中的宗教信仰與政治意涵，將摩西故事中樸素的人性閃光與東北社會的在地化經驗結合，書寫一曲對於愛與善、約定與信念、詩性與神性的挽歌，為東北底層書寫賦予“向上超越”的色彩。

五 結語

如王德威所言，雖然〈平原上的摩西〉是個“沒有神跡的故事”，但我們對神性的期待並不取決於宗教啓蒙，而是與“看待人間境況的意志與方法”息息相關。³³ 雙雪濤筆下的底層書寫，展現出東北底層社會中“未完成的摩西”與“被侮辱被損害的故鄉人”在時代症候下被遮蔽的創傷經驗。“中國套盒”式的嵌套敘事，使雙雪濤的東北底層書寫沒有止步於經濟狂潮下被席捲的工人群體，而是全景式地展現了以工人社群網絡為核心的零餘者們，在階級、性別、代際等身份交織下所遭受的歷史性暴力。通過對《出埃及記》故事的援引，雙雪濤將目光由訴苦式的苦難敘事轉向底層人民在苦難中對理想與信仰的堅守。對底層人民生命能量、生存信仰的發掘，對底層書寫“向上超越性”的探索，是雙雪濤底層敘事的獨特之處，也是當代文學底層敘事的新突破。他從“摩西”出發，帶領讀者重新體會東北平原上人們的磨難，也用詩性的力量為底層建構應許之地，其底層書寫從文學與生命體驗的相互銘刻出發，走向對生存信仰的精神追問。

³⁰ 王本朝：〈基督教為何能夠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社會科學研究》，2007 年 5 期，頁 4。

³¹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頁 5652。

³² 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頁 38。

³³ 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頁 39。